

西南大学博雅论丛



多重文化空间中的 鸳鸯蝴蝶派研究

胡安定 著



中华书局

西南大学博雅论丛



多重文化空间中的 鸳鸯蝴蝶派研究

胡安定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重文化空间中的鸳鸯蝴蝶派研究 / 胡安定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2

(西南大学博雅论丛)

ISBN 978 - 7 - 101 - 08975 - 2

I.多… II.胡… III.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 IV.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3927 号

书 名 多重文化空间中的鸳鸯蝴蝶派研究

著 者 胡安定

丛 书 名 西南大学博雅论丛

责任编辑 罗华彤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250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975 - 2

定 价 40.00 元

西南大学博雅论丛编委会

主 编：刘明华

编委会：

方有国	王本朝	代 迅
刘明华	肖伟胜	余 纪
何宗美	胥洪泉	曹 建

总 序

西南大学博雅论丛在中华书局出版,对于文学院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同仁们,都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丛书题名“博雅”,缘于我院前辈吴宓先生早年倡导的大学应该培育“博雅之士”的教育理念,学院的院训亦为“仁爱·博雅”。因此,博雅论丛的出版便具有了双重意义:一是为纪念吴宓先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八十周年;二为整体展示学院教师尤其是中青年教师的学术成果,推进学科建设更上层楼。

近年来,各大学对科研工作高度重视,一个重要动力是学科建设。学科建设在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目标。作为教育部直属大学的西南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有六十年的积累,一大批著名学者在此传道授业解惑,学术成就斐然,为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的传统,形成了良好的风气。由于各种原因,学科平台建构曾一度滞后,自然也影响了更好更快的发展。好在根基在,风气有,大家有沉稳的心态,在守望学术的时候,也调整思路,积极争取各级各类研究项目,加强与学术界的交流与联系,确保有良好的基础和环境能安心从事科研工作。学校和学院也尽可能提供有利于科研的条件,使中青年学者能够集中精力,以便完成高水平成果。更有一批优秀的青年才俊,基础扎实,视野开阔,理论素养良好,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和拓展,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特色,向学术界交出了比较满意的成果,从而整体推进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本次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的申报成功,就是学术界的前辈、同行和朋友们对这个优良传统的肯定,对近年努力工作的老中青学人辛勤劳动的肯定,对这个学科群体智慧和力量的肯定。丛书的首批作者都是近年毕业的博士,其成果多是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项目及博士基金的结题成果。在专业鉴定上,已得到同行专家的肯定。这批成果陆续出版,必将加强与学术界的交流沟通,并促进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几年前,当中华书局出版我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论丛时,我曾在序

2 多重文化空间中的鸳鸯蝴蝶派研究

中表达过自己对学术工作的认识,那也是自己的信念与坚守。现在看来,还未过时,我援引这段文字作为这篇短序的结束,与从事学术研究的朋友及读者共勉:

一个单位,一个学科的发展,一定有一个持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既不能中断,也无法飞跃。学术不能搞大跃进,学术工作无法春耕秋收。学术活动是一代又一代有志于学的学人们的生命的一部分。个人的学术生命在学科的发展中得到延续。只有具备这样一种精神,学术之花才能结出富有学术含量的硕果。学术工作是艰难的,学术研究也是快乐的。——正是上面这些共识,使得这一个群体薪火传承,多年坚守在古代文学的领地,耕耘着辛勤,收获着快乐。

感谢中华书局对西南大学博雅论丛出版的支持——这也是我们回报社会和学术的一个最好形式。

刘明华

2010年12月冬至夜

于西南大学文学院

目 录

绪 论	1
-----------	---

上编 鸳鸯蝴蝶派群体的形成与划分

第一章 区分中形成:模糊的鸳鸯蝴蝶派	15
第一节 包天笑:晚清走来的“压阵老将”	15
第二节 苏曼殊:鸳鸯蝴蝶派大师,还是新文学之始?	24
第三节 张恨水:“封建余孽”还是“章回小说大家”?	31
第二章 再次区分:全无派别的正宗鸳鸯蝴蝶派	40
第一节 以区分回应区分	40
第二节 “全无派别”的组合	46
第三节 徐枕亚:哀情人生	49
第三章 跨越新旧:灰色的“蝙蝠派”群体	57
第一节 欲新未能新	58
第二节 胡寄尘:“新文学的巨子,旧文学的专家”	65

中编 鸳鸯蝴蝶派传播空间的开创与变迁

第四章 趣味、消闲与日常生活:鸳鸯蝴蝶派传媒的定位与调整	77
第一节 《小说月报》:“灌输新理”与“趣味浓深”	78
第二节 《娱闲录》:娱乐、消闲与新知	86
第三节 《半月》、《紫罗兰》:日常生活的良友	96

2 多重文化空间中的鸳鸯蝴蝶派研究

第五章 哀情何以成潮:正宗鸳鸯蝴蝶派的传播网络	106
第一节 《民权素》、《民权报》:“发祥地”的多重面目	106
第二节 民权出版部:作为文化事件的版权之争	111
第三节 《小说丛报》:“大本营”的聚散	115
第六章 趋新与融合新旧:“蝙蝠派”的传播空间	123
第一节 《新的小说》、《新人》:泰东书局“应时的刊物”	123
第二节 《小说世界》:“冶新旧于一炉”的杂志形态	131

下编 鸳鸯蝴蝶派的自我确认

第七章 如何成“派”:鸳鸯蝴蝶派群体意识的形成	144
第一节 进入一个“圈子”:鸳鸯蝴蝶派与私谊网络	144
第二节 杯酒联欢,切磋文艺:从南社到星社、青社	150
第三节 书局与报纸杂志:传播网络的聚合	157
第八章 旧派才子:鸳鸯蝴蝶派的身份认同	164
第一节 小说家、报人:职业与身份	165
第二节 才子情多:文化裂变中的精神取向	170
第三节 旧派名家:面向新文学的策略性定位	175
第九章 区分中的周旋:鸳鸯蝴蝶派与新文学的斗争和纠葛	182
第一节 走一条“玫瑰之路”:接受区分	182
第二节 戏仿:颠覆与解构	188
第三节 新旧原本一家:同一性策略	195
结 语	200
参考文献	203
后 记	212

绪 论

—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鸳鸯蝴蝶派”^①无疑是一个充满贬义的名称,它已然成了对所有低级、庸俗文学作品的一个概括,是戴在那些非新文学的作家头上“一顶美丽的帽子”^②。鸳鸯蝴蝶派的名称可谓多种多样,如“礼拜六派”、“民国旧派”等,不同的名称也导致范围界定的众说纷纭、标准不一,目前学界主要有三种界定方法:一种是将之当成一个文学流派,视其为一个“流变中的流派”^③,主张从题材、体裁、阵地和团体四方面考察这一流派,认为这一派的文艺目的是为了供饭后工余的消闲和消遣,为达到这一职能,作品要有趣味性和娱乐性。因此,他们惯用的题材是言情、社会、黑幕、历史、宫闱、武侠、侦探、滑稽等等。体裁是长篇小说主要采用章回体,短篇不少承袭传奇文学及笔记小说的体例,还有花样翻

①目前学界对鸳鸯蝴蝶派的称谓有很多种,有以它的老牌杂志《礼拜六》而称之为“礼拜六派”;又有人称之为“民国旧派”(如范烟桥、郑逸梅等人均采用此名称);“民国通俗小说”(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重庆出版社,1991年);或者称为“现代传统风格的都市通俗小说”(林培瑞《论一二十年代传统样式的都市通俗小说》,收入贾植芳编《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良珍《中国现代传统风格的都市通俗小说》,载《齐鲁学刊》1990年第3期);还有认为采用“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最为妥当(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本书还是采用“鸳鸯蝴蝶派”这一名称,因为一则在新文学的长期批判中,使用较多的还是“鸳鸯蝴蝶派”;再则唯有“鸳鸯蝴蝶派”这一名称能凸显问题的复杂性与其特质的多元性。

②魏绍昌《我看鸳鸯蝴蝶派》,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

③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

2 多重文化空间中的鸳鸯蝴蝶派研究

新的“集锦小说”。阵地有报纸副刊和大量杂志、小报。团体主要是青社和星社^①。另外,还有视之为一个庞大而复杂、历时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现象,或带批判眼光以“封建余孽”的鸳鸯蝴蝶派文人创作的反现实主义“逆流”来概括它^②;或客观地勾勒出它发展的各个阶段^③。也有研究者注意到,鸳鸯蝴蝶派这一概念的形成其实是新文学阵营长期批判指认的结果,炮口所及的对象逐渐增多,这一名称下所涵盖的内容也在扩大。因此,鸳鸯蝴蝶派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文学团体或流派,它被定义的真正内涵是20世纪50年代前除了“新文学阵营”外的所有文学文本^④。

对于这样一个“非新文学”的庞然大物,文学史对它的容纳也经历了一个从遮蔽到呈现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的几部文学史均以“逆流”来定位鸳鸯蝴蝶派,如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视鸳鸯蝴蝶派为小说中的“逆流”,指斥其为“追求色情、追求刺激的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文学”^⑤;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也采取类似定性,斥责鸳鸯蝴蝶派“迎合商人与其他小市民庸俗的心理和需要,毒害了青年人纯洁的心灵,鼓励他们走上堕落和毁灭的道路”^⑥。在这种强调“政治正确”的文学史叙述中,鸳鸯蝴蝶派作为“封建文学”的代表,是新文学的斗争对象,自然被加以种种恶谥。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史政治意识形态叙述模式的逐渐形成,鸳鸯蝴蝶派作为“反动逆流”,只能退出历史舞台,长期被文学史所遗忘和湮没。

时至20世纪80年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松动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范式的转变。黄修己曾这样描述“文革”后文学史写作的变化,“入史范围的扩大,打破了革命文学的一统天下,打破了现代文学的纯粹性……受批判的通俗小说,被视为市民文学,旧体诗词被视为仍有重大成就的部门,都喊叫着要挤进现代文学史”^⑦。随着现代文学入史范围的扩大,一

①范伯群《礼拜六的蝴蝶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5页。

②赵遐秋、曾庆瑞《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8页。

③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下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17页。

④赵孝萱《“鸳鸯蝴蝶派”新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⑤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572页。

⑥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509页。

⑦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势大于人”》,载《东方文化》2002年第5期。

些文学史对鸳鸯蝴蝶派采取了部分容纳的方法。有些文学史开始肯定如张恨水这样的鸳鸯作家,将之视为在新文学大旗引导下,皈依到现实主义门下的进步代表^①。而有些文学史则设通俗文学专章论述鸳鸯蝴蝶派,如钱理群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皆是如此。这些文学史都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接纳那些比较符合新文学标准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作品。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认为以往的文学史因忽略了通俗文学流派,只是“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出于对雅俗“两个翅膀”^②的平衡,他们开始了对通俗文学的演进过程进行勾勒。这就导致了独立的通俗小说/文学史的繁荣。范伯群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无疑是这一方面的力作,还有张赣生的《民国通俗小说论稿》等,均对鸳鸯蝴蝶派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这类独立的通俗文学史多以雅俗各自独立的方式看待中国现代文学的格局,将五四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看成两个几乎不相干的系统。

在文学史接纳的同时,学界也开始了对鸳鸯蝴蝶派的关注与研究,最初多是以资料整理工作为主的翻案式研究,能对鸳鸯蝴蝶派的发生发展作较为翔实的勾勒与描绘。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几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与资料汇编,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芮和师、范伯群等人编写的《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魏绍昌主编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范伯群的《礼拜六的蝴蝶梦》,魏绍昌的《我看鸳鸯蝴蝶派》,袁进的《鸳鸯蝴蝶派》,刘扬体的《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等,这些研究对鸳鸯蝴蝶派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尤其是范伯群,长期致力于鸳鸯蝴蝶派史料发掘工作,他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和著作《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对鸳鸯蝴蝶派面貌的勾勒与价值的发现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八九十年代以来的这些奠基性论著,大多难以摆脱以新文学为主导的价值标准,习惯于在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雅俗天然二分的格局中看取问题,台湾学者赵孝萱对此存在的局限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她的《“鸳鸯蝴蝶派”新论》通过一系列的个案研究,透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新旧、雅俗标准背后形成的机制。

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理论方法与视角也多种多样。90年代以来,

①赵遐秋、曾庆瑞《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00页。

②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大众文化逐渐走进研究界的视野,而鸳鸯蝴蝶派因标榜“娱乐”“消闲”,与“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大众文化”^①有着相当的一致。于是一些研究者将它作为一种通俗大众文化形态,从都市形成、媒体发达、市民意识、本土形态等多种要素对它进行分析。例如从传播学角度,不再把文学活动作为作家的单纯创作行为,而是将其置放到传播、消费与接受活动之中进行较为全面地考察。目前有不少研究者认为鸳鸯蝴蝶派作为一种通俗大众文化形态,其兴盛与近世大众传媒的发展密不可分,蒋晓丽在《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一书中对鸳鸯蝴蝶派与大众传媒关系进行探索,对中国近现代“雅文学”与“俗文学”的转换机制中的传媒因素给予关注^②。王利涛在《鸳鸯蝴蝶派与大众传媒关系探微》一文中,则认为大众传媒犹如一把双刃剑,影响了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与创作^③。

另外,作为通俗文学代表的鸳鸯,受众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自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有不少研究者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鸳鸯蝴蝶派的独特价值进行了肯定。马以鑫的《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对鸳鸯蝴蝶派尊重读者反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④。刘扬体从读者的情感需要角度分析言情与武侠小说走俏的原因^⑤。汤哲声则提出,由于新文学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文化观念和创作各有侧重,于是新文学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中的位置各有侧重。新文学更多的人生思考,提出很多的人生理念和思想理念,它的读者主要是新式知识分子,由于这些新式知识分子往往代表着时代的思考,所以新文学是“阅读先导”;中国现代通俗文学更多追求阅读效应,更加关注社会事件和身边事件,于是它的读者主要是广大市民,由于市民人口众多,所以通俗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阅读主体”^⑥。

也有从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史角度,注意到鸳鸯蝴蝶派文学不是一

①王一川主编《大众文化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9页。

②蒋晓丽《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巴蜀书社,2005年。

③王利涛《鸳鸯蝴蝶派与大众传媒关系探微》,载《重庆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④马以鑫《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⑤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

⑥汤哲声《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现代性”和人史问题》,载《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开始就是通俗文学,它本身的发展道路还包括了传统精英知识分子向市场经济转换,建立现代出版制度的文学现代化的社会实践。以鸳鸯派为集中代表的旧文学从精英知识分子立场向通俗文学的真正转型应是在五四新文学兴起以后才最后完成的。正因为五四新文学占领了精英知识分子的制高点(大学课堂、权威刊物、大型出版机构以及一部分权力),他们才逐渐退出精英的立场,转移到大都市的新的媒介——电影电台、报纸副刊、小报连载、连环画等等,开拓了新的领域——都市通俗领域的空间^①。郝庆军的《论鸳鸯蝴蝶派的兴起》,考察了晚清社会改革,尤其是废除科举以后,鸳鸯蝴蝶派作为一个职业化的社群如何进入口岸城市社会,成为一个结构性的社会共同体,解释了它的兴起的历史必然和经济基础^②。

其他还有诸如用比较文学思路,将鸳鸯蝴蝶派与日本砚友社进行对比,发现二者之间的相似性^③。或发掘鸳鸯蝴蝶派小说所受西方文学影响^④。或回顾鸳鸯蝴蝶派作家在清末民初之际对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所作的努力^⑤。以及从叙事学角度考察鸳鸯的文体特征和话语修辞,从形式上追踪窥探鸳鸯小说的文本潜流^⑥。还有从地域文化角度,探寻吴文化对鸳鸯蝴蝶派的影响^⑦。或从民族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待鸳鸯蝴蝶派,如张光芒认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出现及兴盛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其现代性的市民意识的发达正是晚明以来“以情抗理”人学思潮发展的一个结果或一种呼应,是一种在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现代性追求^⑧。另外,余夏云的硕士论文《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的场域占位斗争考察(1896—1949)》运用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勾勒了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场域

①陈思和《我们的学科还很年轻》,载《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②郝庆军《论鸳鸯蝴蝶派的兴起》,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③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④袁荻涌《鸳鸯蝴蝶派小说与西方文学》,载《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⑤李德超、邓静《近代翻译文学史上不该遗忘的角落——鸳鸯蝴蝶派作家的翻译活动及其影响》,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⑥姚玳玫《极致“言情”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叙事策略与修辞效应》,载《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黄丽珍《鸳鸯蝴蝶派小说叙事模式的新变》,载《理论学刊》2002年第2期。

⑦徐采石、金燕玉《鸳鸯蝴蝶派与吴文化》,载《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4期;王木青《吴地柔美之风的文学表达——论鸳鸯蝴蝶派哀情小说》,载《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⑧张光芒《从“鸳派”小说看中国启蒙文学思潮的民族性》,载《学术界》2001年第4期。

斗争的线索^①。

总体上,鸳鸯蝴蝶派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国大陆,港台和海外相对较少。但是,随着研究范式的转变,一些海外汉学家也逐渐将目光转向这一长期被歧视的文学形态。正如有人所指出的“自夏志清与普实克的著作之后,西方对五四文学最具雄心的研究已转而集中于该段文学史其他较为边缘性的取向”^②。林培瑞的《鸳鸯蝴蝶派》与夏志清的《〈玉梨魂〉新论》是西方较早研究鸳鸯蝴蝶派的论著。随着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展开,一些研究者认为鸳鸯蝴蝶派代表的是另一种欲望与日常生活的现代性。如王德威以“被压抑的现代性”泛指晚清、五四及30年代以来,种种不入(主)流的文艺实验。主要指从科幻到狎邪、从鸳鸯蝴蝶到新感觉派、从沈从文到张爱玲等文艺实验^③。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则以女性主义观点分析了鸳鸯蝴蝶派小说^④。唐小兵的《蝶魂花影惜分飞》,提出鸳鸯蝴蝶派这种文化形态,其实代表现代城市文化中对日常生活世俗性欲望的肯定,与五四新文学注重“人生飞扬”,不断走向政治化的一面形成对比,鸳鸯蝴蝶派的所谓“现代的恶趣味”,便是现代都市平民的日常生活所肯定的世俗性和平庸性^⑤。

二

理论方法的翻新与学术范式的转型带来了鸳鸯蝴蝶派研究的繁荣,但从总体上看,迄今为止的研究基本上没有跳出新旧、雅俗等二元对立的僵化框架,因而上述研究成果大多数还是摆脱不了本质主义思维的束缚,从而不能真正地洞识鸳蝴与新文学的深层辩证关系。在这样的思维惯习宰控下,学界对鸳鸯蝴蝶派这样一个庞杂、繁复的对象,动辄加以统一的概括,往往视其为一个静态的整体,而去努力寻找其所谓的共同特征。但

①余夏云《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的场域占位斗争考察(1896—1949)》,西南交通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②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页。

③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④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蔡青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⑤唐小兵《蝶魂花影惜分飞》,《读书》1993年第3期。

由于鸳鸯蝴蝶派恰恰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范畴或话语实践,所谓共同特征其实随着论争对象所定标准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因而对所谓共同特征的追求极易陷入盲人摸象式的偏见。鸳鸯蝴蝶派作为非新文学知识群体的泛称,由于在新文学建构自身的历程中长期以一种负面性的“他者”角色而呈现,同时它随着新文学的发展而不断地建构自身,进而在新文学的指认与自我想象中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知识群体。因此对于这样一个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游移变动的重要知识群体,我们就必须要将其置放到新文学“指认”与自我“认同”的双重视野中进行较全面地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拆解研究中长期存在着的新旧、雅俗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旧习,从而显现鸳鸯蝴蝶派在文学争斗场景与自我想象中暧昧游移的面容,在此基础上才能较为客观公正地看取鸳蝴之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进而重审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新旧、雅俗文学之间深层的复杂关联,及其呈现出来的繁复的文学生态图景。

我们知道“鸳鸯蝴蝶派”这一名称始于五四新文学作家的批判与指认。五四新文学登上文坛,为了确定自己迥异于现存文学样态的特征,首先进行了一系列的命名行为,“鸳鸯蝴蝶派”即是他们赠与民初文学的一个名号。新文学的“命名”是为了与旧文学区别开来,试图通过对“假想敌”的归类与指认等策略,完成自身的理论建设,从而确立自身的主体性与合法性。通过“文学革命”、“白话文学”、“人的文学”等提法,新文学初步厘定了自己的目标,并对民初文坛进行了颇具批判意味的现象描述,这些现象都被他们归入“旧文学”、“旧文化”的名号之下,成了他们所提倡的“新文学”、“新文化”的对立面。新文学的批判所及对象,有一个逐渐清晰的过程,从局部到整体,从现象到观念。从20年代到30年代,虽然新文学的目标不断变化,群体内部也在发生分化,但鸳鸯蝴蝶派一直是其共同的对立物,批判范围也在扩大,一些后起之秀被累加进鸳鸯蝴蝶派这一阵营之中。而且,随着新文学逐渐成为一种新的“雅”文学,与之相对,鸳鸯蝴蝶派就成了通俗文学的指称。

正因为鸳鸯蝴蝶派是作为新文学的对立物而被命名和界定。因此,自五四以来,新文学群体的攻讦之辞诸如“趣味”、“消闲”、“金钱”、“游戏”、“封建意识”等,就一直与鸳鸯蝴蝶派如影随形,影响至今。尽管文学史对它的容纳经历了一个从遮蔽、歧视到视之为现代文学不可缺少的“另半部”的过程,但总体上,目前一些主流文学史与研究论著仍然难以摆脱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二元对立的僵化模式,在新旧、雅俗二分的格局中描述鸳鸯蝴蝶派,一味地强调二者在诸如审美风格、文学观念等方面的

不同。但我们必须注意到,首先,鸳鸯蝴蝶派与新文学之间多样与复杂的纠葛、争斗被简化为二元对立的关系,无疑忽视了二者之间因互动与互渗而呈现的斑驳色彩。正如有研究者论及新文学倡导者的二元对立立场时指出:“几乎新文学倡导者以简捷方式提出的每一对命题,都会落在其他命题的复杂纠缠中。孤立地看每一组二元对立,确是你死我活,水火不容,但多组二元对立之间,却绞缠着冲突与参照、排斥与融汇。这样,虽然新文学倡导者确曾试图构筑黑白分明的森严壁垒,而分明的‘黑’与‘白’却因交叉与错位而呈现出斑驳的色彩。”^①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之间也是如此,二者并非是泾渭分明的两种文学形态,其实存在着斗争中的纠缠与交叉,所谓新旧、雅俗二分与对立的勾勒其实包含着研究者自己的价值评判。在这种主观臆断中,它们之间还有一个驳杂、含混的灰色地带被长期忽视了,这个超越了二元对立的互动、互渗的“第三度”文学空间无疑为重审新旧、雅俗文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契机。

其次,鸳鸯蝴蝶派并不天然的就与“旧”、“俗”有着联系,它之所以被目为“旧文学”、“通俗文学”,其实是处于同一文化空间中不同知识群体、文学形态争斗与整合的结果。诚如研究者所言:“通俗文学领域的出现是以下两种情况的产物,独占排他的机制,通俗文学由此而成为文学的‘另类’;大众传播和大众教育机构的发展,这为象征形式的大规模生产和广泛流通创造了条件。”^②鸳鸯蝴蝶派之被视为通俗文学即是如此。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之所以能够新旧、雅俗二分,恰恰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几乎共同的文学平台、文化传播空间。在近现代中国,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传统秩序的崩塌,知识分子必须重新寻求自己的位置,而都市大众传媒的兴盛与学校等教育机构的发展,造就了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空间,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谋生与实现自己价值的平台。鸳鸯蝴蝶派与新文学作为不同的知识群体,他们其实同处于这个社会文化空间,因此都有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占据位置、争夺资源的要求。所谓新旧、雅俗的区分正是这文化空间中占位、争斗的手段与结果。

那么,处于同一文化空间中鸳鸯蝴蝶派与新文学之间的争斗是如何

①刘纳《二元对立与矛盾绞缠:中国现代文学发难理论以及历史流变的复杂性》,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4期。

②(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钰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62页。

进行的呢？它们对立中的交叉与互动又是如何体现的？它们之间新旧、雅俗的二元对立与等级制度又是如何被制造出来并广为接纳，成为一种常识的？鸳鸯蝴蝶派的形象又是如何建构出来的？本书通过查阅大量的原始相关文献，力图回到新、旧文学论争的历史鲜活现场，来考察这一复杂的过程。所以，本书关注的重点不是鸳鸯蝴蝶派本来面目如何，哪些作家作品可以放入这一流派。而是主要探讨：为什么一些作家作品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在它的生产、传播、阅读、社会评价中，它的文学、文化空间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是如何进行形象建构与身份认同的？文中“鸳鸯蝴蝶派”并非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或范畴，而是一种话语实践，即它是由创造主体基于不同的立场来专门应对特定的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情境而行使的言语行为，它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的清晰的招式与姿态”^①。因此，作为一个群体，它是一个由建构、想象而生成的动态群体；就个体而言，其中的作家对自己的身份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寻求、认同的过程。在鸳鸯蝴蝶派的群体想象与自我认同中，新文学界的外在区隔、指认是基本机制，而其自我确认则是主要策略，传播空间又是它们之间斗争、分化与聚合的重要平台。因此，本书拟从鸳鸯蝴蝶派群体划分、传播空间开创及变迁、自我确认三个方面进行勾勒与探究。

首先，就群体而言，区分化（或区隔）机制是鸳鸯蝴蝶派划分与形成的基础。新文学对鸳鸯蝴蝶派的指认与批判，就是通过命名，制造区分和差异。诚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差异是客观的，但在人们表征这个世界的过程中，不断被主观地挑选、制造、掩盖等。在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差异的功能在于为特定事物构成‘边界’。‘边界’是将不同事物或对立事物双方截然分开的关键，我们无法准确定义没有边界的事物，所以由差异所建构的边界在事物能为人们所认识方面是至关重要的，而一事物的边界就是它与其他事物的相异之处。”^②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之间的差异与区别即是如此，自五四初期一直到30年代，在“新文学”/“旧文学”、“人的文学”/“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进步的大众文艺”/“封建的小市民文艺”的一系列对立中，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被一次次加以区

①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孟祥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引言第11页。

②徐连明《差异化表征：当代中国时尚杂志“书写白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1页。